

勵耘學刊

总第十六辑 二〇一二年

華苑出版社

卷二

励耘学刊

(文学卷)

2012 年第 2 辑
(总第 16 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励耘学刊·总第 16 辑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077-4246-4

I. ①励…II. ①北…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丛刊
②汉语－语言学－丛刊 IV. ①I206-55 ②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4949 号



出版人：孟 白

责任编辑：刘 丰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印 刷 厂：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787×1092 1/16

印 张：32.75（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

字 数：522 千字（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

版 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15.00 元（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本）

《励耘学刊》（文学卷）编委会

顾问 童庆炳

主编 郭英德

副主编 李春青 李山 杨联芬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翠玲 万建中 王向远 方宁

乐黛云 过常宝 刘利 刘晓南

孙银新 李山 李正荣 李宇明

李运富 李国英 李怡 李春青

李强 杨义 杨联芬 吴福祥

张健 张涌泉 张清华 陈思和

郑国民 项楚 赵勇 姚建彬

郭英德 黄开发 曹卫东 盛宁

董晓萍 蒋原伦 蒋冀骋 温儒敏

冯胜利 (美国) 大西克也 (日本)

徐富昌 (中国台湾) 黄坤尧 (中国香港)

李欧梵 (中国香港)

编务 许庆江

目 录

励耘论坛

启功先生的清代宫廷学问与中国传统文化

- 兼略谈启功先生与钟敬文先生的学术交谊 董晓萍 (1)
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并非兰亭后序 周 燕 (10)
启功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致辞 曹卫东 (26)
启功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讲话稿 过常宝 (28)
纪念启功先生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裴云龙 (30)

新视域

- 大河的尽头，就是源头：李永平的《大河尽头》 王德威 (35)
不只是“风景”的细节：论骆以军《远方》的两岸底层
书写及其后现代艺术观的辩证尝试 黄文倩 (45)
在大小传统之间
——“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 柯希璐 (71)
宏观背景 出版视角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多维思考 于翠玲 (83)

文学史研究

友情的转型及其意义

- 论唐宋之际赠答诗的变迁 谢 琰 (94)

从选诗学看王渔洋唐诗观：

以《唐人万首绝句选》为例…………… [新加坡] 廖启明 (105)

以传奇志现代

——论徐訏上海罗曼司的文学特质与文化意涵………… 陈硕文 (120)

性别书写与身份认同

——以 20 世纪 40 年代间谍题材流行文本

《野玫瑰》、《风萧萧》为例 ……………… 曹 典 (141)

文献考辨

《虬髯客传》作者献疑 ……………… 李小龙 (159)

鲁迅的“鬼品店” ……………… 张向东 (178)

青年园地

夏含夷《略论今文〈尚书〉周书各篇的著作时代》

之商榷…………… 李 辉 (187)

论《庄子》的变形策略…………… 高建文 (200)

文史名家

文学史家郭志刚…………… 郭国昌 (217)

品书录

朴学、史学与美学的珠联璧合

——《陆侃如冯沅君合集》读后…………… 郭英德 (224)

别样的精彩：读黄忠慎教授《清代诗经学论稿》…………… 陈 才 (235)

《励耘学刊》(文学卷) 征稿启事

启功先生的清代宫廷学问与中国传统文化

——兼略谈启功先生与钟敬文先生的学术友谊^①

◇董晓萍^②

摘要：启功先生以清代宫廷文化研究擅胜。在中国传统整体文化中，这是一种差异性文化，曾专为上层阶级所用，与普通人的知识系统和日常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但它却在集权制度下形成了绝世精品和优秀人才，集中了中国传统整体文化中的一些要素。仅就民俗学研究而言，至少有一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如传统整体文化与清宫文化、北京首都城市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关系。而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传统整体文化研究与现代学科分类的矛盾，要正确理解上中下三层文化打通研究的必要性。从方法论上讲，启功先生的学问是体验的，因而是描述的，但正是这种描述能接近事物的本质，成为理论的核心。现代人文科学提倡多元文化研究，启功先生的学问以独步清宫文化研究而出入多元，尤能显示其特殊的学术价值。从启功先生的学问看，传统文化研究不是抽象的框架，而是富有本土特征的文化理念、行为逻辑、亲密性和凝聚力的结合体。对这种学问的独立学术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它也反映了现代人认识自身传统文化特征的漫长历程。在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已逐步深入，多元文化研究也在迅速展开，为我国政府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学术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研究启功先生学问的历史文化模式和特种学术精髓还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启功；传统文化；清代宫廷文化；民俗文化；多元文化研究

我因启功先生的引导而师从钟敬文先生，二老都生于 20 世纪初，收授我等后学时已是 20 世纪后期。其间历史变革、社会前进。启功先生在新中国高校建设的历程中，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红学家、

① 此为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 2012 年 10 月召开的纪念启功先生 100 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讲稿，由于会议时间的限制，所述相当简略。本文的发表得到李山教授的鼓励，谨此致谢！

② 董晓萍，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物鉴定家、诗人和书画艺术家，而集其学问之大成者是清代宫廷文化研究。2000 年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钟、启二老特邀王宁先生主事，三个传统学科（民俗、文献和文字）联袂，开展上中下三层文化打通研究。这时启功先生的分类学科是古典文献学，其实是坐拥清代宫廷文化研究的独特优势。

研究启功先生的学问，有千丝万缕的头绪，但最能打动学者的问题，是他的清代宫廷学问在现代大学学科中的独立身份。所谓独立身份，包括基本概念、研究范围、来自学科内外的批评及其合理性。实际上，这些问题从未停止在他与学科分类面对面的讨论中。在这背后，则是传统文化整体性与现代学科分类的两种体系的矛盾。20 世纪是学科分类的时代。分类促进了现代教育的发展，却忽略了传统文化整体性的重要位置，更忽略了对这种整体文化中的特色优秀遗产的诠释和弘扬。清代康、乾、雍至后世的宫廷文化中的优秀经典文化，是这种整体文化需要继承的内容。这一阶段的文化到了 18 世纪至 19 世纪中期，还与西方先进人文学说和技术文化相融合，产生了很多重要成就。启功先生正是这种文化的嫡传者。

我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但没有清代文化的接续，现在就什么文明也看不见。清代宫廷优秀文化是我国现存历史文明中的镇山之宝。它们就在故宫、国子监、雍和宫、颐和园和皇史宬之中，至今可触可摸。它们曾经为上层阶级所享用，与普通人的知识系统和日常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但它们却在集权制度下形成了大量绝世精品和极为优秀的人才，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现在它们的很多绝世遗存都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启功先生正是描述和研究它们的全方位的专家。

启功先生出生的年代，正值辛亥革命成功，他的人生几乎有与生俱来的挫折感。但他顺应了时代的巨变。他接受了启蒙教育和新式教育。当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他的求学和工作的时期，社会正经历着五四运动以后的思想熏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成长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委屈，但他一直在勤奋、出色地做好组织分配的工作。改革开放后，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宫廷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都得到了理应得到的研究。全球化到来之后，在世界上，霸权文化和一元文化纷纷瓦解，^①原来被压抑的多元文化或难以分类的本土

^① Skul tans, 2004, 引自 Anna-Leena Siikala, A New Generation, in Folklore Fellows' Network, Helsinki, Finland, 2010, p.3.

文化，都在恢复建设并补充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也都有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重新识别或复兴自己的独立身份。在国内高校教育中，也要重新自觉地确认这类研究对象的独立学术身份，因为它们所指向的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不同民族的特有文化，包括宗教、哲学、价值观、历史文物文化和民俗等，正是确认本民族传统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因素。^① 钟先生和启功先生的学问，都在确认或逐步确认独立的学术身份中，获得新的发展。

启功先生虽有家族成就却从不炫耀。他的这一支裔即使疏弱，他也总是谨慎而自强的。他对晚辈的学问传授，是丰富的清代学术文化知识和相关上层经典文化，而不是着眼于做过什么官，或者是计较盛衰的，所以人们都可以认同。启功先生的这种为人和为学是很正确的。从他的教育中，各学科的后辈和各层面的后人都能受益。述往思来，比起现代分类指标造成文化通识教育的断裂带来的恶果，启功先生的学问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整体性教育的价值，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对启先生学问的独立学术身份的认识，不在于这种学问的本身，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认识自身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漫长历程和曲折过程。现在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已逐步深入，研究和继承启功先生的学问的历史文化模式和特种学术精髓，已成为后学的长期任务。

从民俗学的角度说，研究启功先生的学问，至少有三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如传统文化与清宫文化、传统文化与北京首都城市文化、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关系等。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除了避免学科分类的弊病，还要探索上中下三层文化打通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也要了解启功先生的治学方法。以下简要谈谈个人看法。

一、传统文化与清宫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代宫廷文化是一个片段。我们不能删除片段而求整体，也不能夸大片段去覆盖整体。从启功先生的著述看，他所阐释的清代宫廷文化，在传统文化与清宫文化的接续上，有两点是值得注

^① 汤一介《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跨文化对话》第6期，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0、22页。

意的：一是清代经典文学文化与国家大一统管理的政治向心力的关系，二是清代首都城市建设与国家史的关系。这两者都是启功先生经常涉及的话题。清代几度发生重大变迁，多民族文化融通，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资源得到广泛的利用，各国文化在此交流等，都与这两点有关。它们使清代思想精华借助于此向整个社会文化渗透。

了解启功先生的清代宫廷学问，首先要读懂他的书画艺术作品，这是因为它们是领会清代文史哲和社会文化的相对容易的部分，是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了解启功先生的学问，还要了解他的诗词创作，而他的创作观的精华，大量来自他对上层文化的观察、领悟和亲身经历得来的体验。他用他的体验去消化和品评现代理论。他需要在个人体验和理论消化之间停下来，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去重新提炼理论的心得，这样他所得出的就是与原来理论不同的、一种独到的东西，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①他为此讲的很多道理，都是中国式的文艺理论，其实与现代文艺学的观点和方法是十分接近的。现代人要在他的这种能停下来的动态思维中，认识他的治学特征，并将之变成现代知识。

就启功先生和钟敬文先生的交往讲，两人的传统学问功夫都足见于诗。诗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最高境界，对前辈学者来说，就是不区分学科，也要区分出诗的修养和造诣。他们的史识见于诗，学养见于诗，接人待物见于诗，高风亮节见于诗。钟老和启功先生因此都爱王渔洋诗。^②与钟

① 本文讨论启功先生的体验之学受到毕莱德（J.F.Billeter）研究的启发，但毕莱德分析庄子的体验是要找出神话思维怎样为庄子所用，本文认为启功先生的体验特征是对现实事物的观察和处理，产生经验性行为。关于毕莱德原文的阐述，参见（瑞士）毕莱德（J.F.Billeter）《庄子四讲》，宋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2—33页。

② 肖立、董晓萍《世纪老人的话——钟敬文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关于钟敬文先生和启功先生对王渔阳诗的共同看法，详见本书第8—9页，原文为：“1989年，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给我出了一本散文选，我送给启功先生一本，他看过后，我问他印象如何，他说一句话，说‘白话《蚕尾集》’。《蚕尾集》是清初诗人王渔阳的文集，我初到杭州的那些年，把《渔阳山人著述》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是一部大书，我很喜欢读，启功先生评价我的散文是王渔阳著作的白话体，这句话是从他的学问中得来的，是他的智慧，他看得出来，一般没有他那种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就说不出这个话。”另见本书第118页：“钟敬文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对苏东坡、张宗子、袁中郎和王渔阳一流‘才子’们的喜爱。……至于约见学生和来访者以前，每每手持一本王渔阳的诗文集低声吟诵，自得其乐，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习惯。”启功先生深知王渔阳的例子，如启功七言诗《社课咏春柳四首拟渔阳秋柳之作》，启功《启功韵语精选》册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页。

老相比，启功先生更能写绝品诗，别人谁都模仿不了，这同样与他的独特体验有关。体验，使启功先生能说自己的话。他的学问中的有些东西，已是现代人不大注意的方面，启功先生却能将之加工成思想资料的要点。它们与我们在现代教育中学到的、比较容易解释的一些知识，在表述上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学习过程中也有不同的阶段，这就造成了他的某些学问有一种对现代人而言的“不可传授性”，而他本人经过刻苦锻炼已达成了行动之自然，获得了怡然自得的享受感，因而能写出诗歌文学中的极品。它们不能被模仿，却能在现代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深受广大人民喜爱。这些都是现代教育失去的宝贵东西。

启功先生的学问由“转益多师”而得，但他学老师的话，是用体验去领会和消化的，再发展成自己的话。他把老师的话放到礼仪中，肃穆恭敬，从不改变。现在很多学生没有自己的体验，在学校时学了老师的话，毕了业就把老师的话当成自己的话，结果没有了崇尚礼仪的境界，没有了师道尊严，更谈不上有个人的创新成就，这是启功先生所不为之事。启先生学问中的这些精神财富是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相一致的。他珍惜大自然和社会的赐予，坚定自己的目标，成就了不朽的学术人格。

二、传统文化与北京首都文化

启功先生是北京人，他身上有北京人特有的疏朗、通透和豁达。北京有比此前任何朝代的古都都明显的首都城市文化特征，启先生在这方面也独有建树。

自清代以来，北京吸收了全国不同历史地理区域内的、不同民族聚居区的、不同宗教生活的和不同中外思想文化技术人物的资源优势，拥有了历史以来最趋于相对完整的、具有首都向心力的文献文化系统。现在的北京首都文化正是在这种历史氛围中积淀下来的首都城市遗产。北京有四种影响对启功先生是必不可少的，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多民族融合中心和中外交流中心。它们都是启功先生的人生文化的共有根基，也是他的清宫学问多元共生的支脉。我们从启功先生的清代学问中能发掘北京首都文化研究的多种专题，探索北京清代宫廷文化与中国历史文明的深刻联系。

清代宫廷吸收儒学和佛学达到极致。清代康、乾、雍时期在吸收佛

学时，还采纳了部分当时的西方先进宗教学说，因此这种吸收也达到了历代宫廷佛教文化的极致。特别是藏传佛教，仰赖清皇室和清政府的丰厚养赡得到了优越的发展机会，同时，在北京的政治生活和文化教育传播中，增添了佛教哲学与佛教艺术的内容。这些都深刻地渗透到启功先生的学问中。佛教是他的信仰。信仰能产生吸收的动力，信仰到了精神的最深处就有大到无条件的吸性动力。我们从这方面看启功先生的著述和人生，所得到的营养就不是一点点。启功先生是深谙佛学的，他对母亲和夫人，对人对事，都极为虔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与老师、亲人和朋友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始终关心弟子的学业进步。他对哺育他成长的北京、亲友和中华文化真情永存。

北京也是皇城土木建筑豪华密集和高度传统审美化的城市，它对启功先生的熏染也是深刻的。启功先生的审美意识是极美的。目前对他的学问中的美学观的研究，虽然还不如研究他的书法艺术那样容易成为焦点，但相信仍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

三、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

启功先生与钟敬文先生友谊深厚，但他们从学问渊源到人生系统都是不同的人，钟老曾写诗给启功先生说两人“三冬文史各根源”。^①但启功先生照样能与钟老谈民俗，从民俗学的角度也能看到启功先生在接受巨大差异性领域的文化资料上的特殊能力。

启功先生有接受民俗与自我相异性文化的学术态度。他能完全接受其相异之处，并能在自己的身上表现出他者的智慧，如他对子弟书的看法。^②我们拿他的东西与清代的书互看，发现他能说出一般人说不出来的很多东西。在他的教导下，我了解到北京清代民俗文献的基本特点有

^① 钟敬文先生此诗题目为《祝元白（启功）先生八十寿辰》，原文为：“合从释氏问因缘，卅载京门讲习连。一夕雷霆同劫难，三冬文史各根源。小诗共喜吟红叶，羌语常劳费玉笺。闻说灵椿八千岁，吾侪今日只雏年”。《钟敬文文集·诗词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8页。

^②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河北滦县、唐山、迁西、青龙、秦皇岛等地搜集到一批旧藏皮影影卷，启功先生见状，嘱我注意与清代子弟书做比较研究，他对子弟书和影卷的熟悉程度让我惊讶。

三：一是“繁盛录”，用以描写燕京帝王盛世生活的场景，及其对中华一统文化的认同；二是“观风知政”，沿袭儒家的政治文化观；三是“田园化”，把社会文化冲突化解到民间叙事中，获得思想上和出版上的双重安全感。^①他的学问还由清代民俗文献延伸到对唐宋笔记小说的评价，以及对文人雅士的诗话和词话的口述史的认识。他有不少看法与现代海外汉学的前沿研究不谋而合。口头讲述中的许多东西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如手眼肩的动作、口气和意趣，但到了启功先生的口中，都能变成口头文化。我举个例子。有一次，钟老问启功先生，可不可以向他学书法，说完钟老就在启功先生的书案上试笔。启功先生见状笑曰，“你看他的手不抖”。启功先生为钟老常年免费写各种诗词字幅，他了解钟老，这是在表达深切的婉谢。而他又是极其恭谦之人，绝不会在钟老面前“好为人师”，于是他就说“你看他的手不抖”。启功先生的这种故事很多，他的描述真是能达到简约自如、随性即起的程度，而他又正是在这些地方表现出极富思辨性，聪明智慧到了脱口而出、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描述很多师友的手眼动作都很传神，轻松又幽默，这使他跟我们谈口述史，与我们跟他谈民俗，中间没有开关，你一句、我一句，能互相理解。他在这些描述中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文化理念、行为逻辑、亲密性和凝聚力。没有了它们，启功先生的学问就成了死的语言和死的书本，大概连他自己都不要。

历史是容易遗忘的。现代人已不大了解清代宫廷历史文化。对当下喜欢西方时尚的现代青年人来说，启功先生阐述清代宫廷文化还等于“背过身子讲话”。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启功先生的学问反而应该引起后学的兴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清人与现代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已大不相同。清人用它们来描述整个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而现代人只用它们来解释与自己有别的历史过往。在两者之间，描述却有更高的学问层次，因为正是在这种描述中，带有人类与自然事物无限亲近又安于自然秩序的基本经验；也因为正是这种描述能让人们接触到事物的本身，成为理论的核心。他对清代宫廷文化的描述性研究，也是可以转为一种根本上的共同经验的描述的。这件事成立与否，全在于后学的见识和学问功夫。

^① 董晓萍《清乾隆时期朝鲜使者手记中的北京民俗与政治》，收入陈平原主编《北京都市文化的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9—486页。

研究启功先生的学问，不能不提出任何问题就埋头苦干。我们要了解他与他的学问及其多元人文环境的关系逻辑、世界观、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要了解他对待自我与他者的智慧；要了解他所承袭的清代宫廷文化与中国传统整体文化相比，是一种有差异性的文化遗产，但他的研究成果不是取消文化差异，而是将差异视为一种共享资料，而非一种障碍。启功先生还告诉我们一种经验，即他的人生时间的运用方法，他可以在单一时间做一件事情，也可以在多元时间同时进行多种活动，这出自他的多元文化和多元人生观，而如何把各自的文化协调起来？这是关键。启功先生做学问的职业道德就是知道、觉悟、好奇、注意、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的大善知识和大智慧。

参考文献

- [1] 启功.诗文声律论稿 [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2] 启功.启功丛稿 [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3] 启功.汉语现象论丛 [M].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1.
- [4] 启功.论书绝句 [M].北京:三联书店, 1997.
- [5] 启功.说八股 [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 [6] 启功.启功韵语精选 [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7] 启功.启功日记 [M].北京:中华书局, 2012.
- [8] 钟敬文.钟敬文文集·诗词卷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9] 陈平原主编《北京都市文化的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Professor Qi Gong's Research on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ong Xiaoping

(Center for Folklore, Ancient Writing and Chinese Characters, BNU)

Abstract: Professor Qi Gong was good at research on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culture, which was a specific culture belonging to the royal family in the pas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culture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knowledge and daily life of the ordinary people. However, it collected many talented literatis in the centralization of the state power, and has offered

many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entir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is worth studying in terms of folklore study,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culture, old Beijing's capital culture and its folk culture. In such research, the primary issue is how to deal with the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between the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modern sciences so as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cessity of research on the higher, the middle and the lower culture in China as a whole. As for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it was mainly based on his experiences, and mostly descriptive, which was close to the nature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became the core of his theory. Nowadays, the multicultural study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Professor. Qi' s research shows its special academic value due to his study on Qing imperial court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ulticultural study. According to Professor Qi, study on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not an abstract framework, but an integration of plenty cultural notions full of local features, behavioral patterns, closeness and cohesion. To understand this independent academic identity is a long and winding journey for modern people to reflect on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traditional culture. Now Chinese reseach on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reached into a new stage with its focus on the multicultural study to a large extent, which provides academic support in the government's policy-making of both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safeguarding. Therefore, it is of significant social implication and a long-term task to pass o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odel of Professor. Qi's research and obtain his unique academic essences of his research.

Key words: Professor Qi Gong; Traditional Culture; Qing Imperial Court Culture; Folk Culture; Research on Diversity of Culture

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并非兰亭后序

◇周 燕^①

摘要：东晋文人孙绰作有一篇题为《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的文章，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为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兰亭雅集所作的后序，并经常被与王羲之《兰亭序》并提。尽管孙绰在该文中明确标识了它的发生地点并非兰亭，后人却只信其流传中并不可靠的题目，而不详究文本，多少年以来误将其视作兰亭雅集的成果。本文通过考察相关地理文献并详细比对孙绰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三月三日诗》、王羲之《兰亭序》以及兰亭雅集诸文人的《兰亭诗》可知，孙绰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一文并非出自永和九年的兰亭集会，而是为另外一次上巳修禊写的诗序。

关键词：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王羲之；《兰亭序》；兰亭集会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统、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王肃之、袁峤之、王彬之、王丰之、徐丰之、庾友、孙嗣、王涣之、曹茂之、王蕴之、曹华、虞说、谢绎、魏滂等41位文人^②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了一次上巳修禊集会，即著名的“兰亭集会”，或称“兰亭雅集”。文人们列坐曲水、流觞吟咏，作成37首《兰亭诗》。王羲之为之挥毫写作的《兰亭序》^③更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学、书法名篇。孙绰是兰亭集会的参加者之一，他有一篇后世题为《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的文章。此文自宋代以来一直被当作兰亭集会上写的后序，与王羲之《兰亭序》并提。然而，考查相关文献可知，孙绰虽参加了

① 周燕，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② 41人为《世说新语》所引《临河序》的说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亦持此说，另有42人一说，见宋人施宿所撰《嘉泰会稽志》载《天章寺碑》所列，对此本文不展开论述。

③《兰亭序》是王羲之这篇序文较为常见的标题，严可均《全晋文》辑录王羲之作品时与本文所论的孙绰序文同用《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为题，本文在论述中仍以《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指称孙绰之序，而以《兰亭序》指称王羲之的序文。

王羲之主持的兰亭雅集，但他这篇被后人名之以《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的文章却并非作于兰亭集会，而是他在另外一次上巳文人集会上作的诗序。

一、《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与《兰亭序》的相关史料辨析

首先从兰亭雅集当时的资料来看，可以确定产生于兰亭集会的文字成果仅有《兰亭诗》37首和王羲之《兰亭序》1篇，以及《世说新语》所引部分《临河叙》。37首《兰亭诗》在各种资料中的记载除个别字词外基本一致，《兰亭序》则因其书法价值而世代流传。兰亭雅集当时资料中以及所有后世流传的资料中都没有任何记载提到孙绰曾有过为兰亭集会创作后序之举，孙绰序文之“兰亭”标题来得颇为无端。^①《世说新语·企羡》引王羲之《临河叙》^②为：“……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③十五人赋诗不成被罚酒的细节也有记录，如若孙绰果真为这次集会写了这样一篇不算短的后序的话，《兰亭序》或《临河叙》中理应有所记录，其他资料中也不会只字不提。

① 毛万宝先生在《兰亭雅集：文本、误读与挪借》（《美术报》2007.9.22）一文中对孙绰写后序做了如下想象：“而作为内容之四的作序纪盛，虽非王羲之首倡（因兰亭雅集之前的金谷诗会，已有潘岳作过《金谷诗序》），但王羲之特意与孙绰商定，两人同时作序，一‘前’一‘后’，从不同角度来记述雅集活动全过程，却显示了一种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晚清之后，有人曾怀疑过今传王羲之的《兰亭序》文章与书法，但谁也没有怀疑过兰亭雅集的真实性。《兰亭序》文帖怀疑者对《临河序》与孙绰的后序一直都持肯定态度），可以设想，没有前后两序的撰写与流传，那兰亭雅集就有可能被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其根据大约仅仅是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这个题目，但此题目在其文章流传的漫长历史中多被编纂者据己意随意改变，绝不应以之作为想象兰亭雅集当时情境的根据。所有可见资料中更无任何证据说明王羲之曾经有“特意与孙绰商定”写序这一行为，此说甚缺乏凭据。而所谓对“孙绰的后序一直都持肯定态度”也仅是宋代以后才被习用的说法，实非“一直”，这种模糊的时间界定当然亦不该作为想象历史事实的依据。另外，作《金谷诗序》的是石崇而非潘岳。

② 张廷银先生认为《临河叙》为《兰亭集序》的定稿是值得参考的结论。参见张廷银：《〈兰亭序〉的真伪及〈兰亭诗〉创作的文化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4期，第88—92页。

③ [南朝宋]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31页。